

如何科学认识和推进中国式养老

□ 胡 湛

养老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主题。它不仅涉及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更是国家责任和社会福祉的集成体现。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常态，当代老龄社会的养老议题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治理复杂性，不仅关乎人口共性需求，更饱含国家特性与文化个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文化古国。随着党和国家决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亟须通过扎实的调研工作，将中国式养老付诸实践。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如何落实中国式养老，以推进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已经成为重大治理议题，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并将为全球老龄社会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特殊性。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规模2024年将过3亿人，预计在本世纪中叶将达5亿人，并面临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域辽阔而地区差异大等约束条件，养老任务繁重而复杂。目前看来，人类社会尚未具备面对如此超大人口尺度、超复杂地理范畴的养老经验。因此，我们亟须基于中国国情综合研判老龄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对养老制度安排的影响机制，加快建构人口与老龄研究相关学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弥补科研空白，为落实中国式养老而夯实科学基础。

多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导下，经过不断摸索和试验，我国养老制度体系已经历多轮改革，凝结众多研究实践成果，尤其体现于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资源配置模式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推动养老保障模式从非缴费的福利型向缴费为主的保险型转变，不到30年间，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面临转型、初创、拓展、改革等任务叠加，并不断受到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影响，目前正努力实现全国统筹和“应保尽

保”，其治理难度为西方社会所未遇。近期，受1962—1973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影响，2023年起每天约有6万人口达到60岁。相对于“十三五”时期，“十四五”期间养老金支出明显增长，预计“十五五”和“十六五”时将分别提高15.6%和19.5%以上。为此，应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并保证其平稳推行，在此基础上将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养老金改革方案，建立科学的调控均衡机制并积极寻求新筹资渠道。与此同时，未来10年预计新增1.4亿农村转移城镇人口，且其老龄人口结构仍相对年轻。这是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均等化的关键窗口期，应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落实省级统筹支，并根据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养老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和安宁疗护制度，形成中国特色养老制度安排机制。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文化命题，应强化家庭建设以赋能赋意。“养老”一词极具中国特色，取“奉养老人”之意。中国有绵延千年的孝老、敬老、尊老传统，源于丰厚的家文化。我国最早一部辞书类著作《尔雅》中对“孝”定义为“善事父母为孝”；《论语·为政》载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说新语·德行》概括为“事亲尽色养之孝”。这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养老”的核心观念——“色养”，即养老不仅是功能性和技术性的，而且应更重视方式方法和伦理价值，其中蕴含深厚的家国文化逻辑并推演到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奠定了中国式养老的文化底色、价值基础和资源禀赋，更构成中华文明的要件之一。

目前，“一老一小”已成为我国民生建设重中之重，“一老”直指养老工作，“一小”又涉及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老”和“小”还常共存于“一家”。因此，完善家庭功能可以内在地整合覆盖不同照护对象。一方面，应强化制度支持和文化肯定，不仅“赋能”更要“赋意”。建

议加快树立积极老龄观和新时代家庭观，将“一老一小”更完整地表述为“一老一小一家”，将其作为养老、家庭、生育支持等政策抓手，通过将资源注入家庭使其流转起来，一揽子地整合应对养老、抚幼、特殊群体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等综合议题。另一方面，应引导和支持不同年龄和代际群体有意识地进行养老准备和家庭财务规划，优化中老年群体的技能禀赋及就业环境，有效充实家庭养老资源储备。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话语权议题，应凝练中国概念与开展全球对话。伴随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形成诸多值得他国参考的经验，但在国际对话中有时还存在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等情况，尤其是一些传统专业评价体系仍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欠缺了解，不少研究也常将中国式叙事及创新实践，置于证伪或证实西方理论通用性的研究套路之下，欠缺有效的理论突破和标准革新。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生老病死有其共性，更有强烈的个性特征，这不仅是评价体系优化的技术性问题，更指向话语体系和能力的有效构建。中国自带“养老”的文化历史基因，中国式养老源自对中华传统和中国实践的不断注解，在“养老”之前缀以“中国式”，体现了一种对历史性与现代性的整合责任，尤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我们要交流共性并明确个性，应考虑将“养老”翻译为“Yanglao”并丰实其内涵外延，构建国际话语权，与人类多元文明积极对话。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在全球化语境下开发老龄社会发展新动能，将养老产业发展与话语权构建相同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作为2024年国办1号文印发。通过培育银发经济的新需求和激发老龄消费的新潜能，将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人口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将与科技发展、生产方式变迁等趋势相结合以系统改善老年人生活品质，从而促进养老资源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均

衡。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发展银发经济对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及应用创新的诉求还将在全球化平台上产生更广泛的连锁效应，不仅可能产生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而且可能形成新理论、新观念和新话语。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重大治理主题，应尽快补齐法律法规短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将“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列为工作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体现了相关改革的最新部署。

当前在中国式养老的建构发展中，应尽快在涉老制度建设中补齐法律法规短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制度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体现于养老、照护、健康促进等领域，却也呈现出“政策多，法规少”的处境。国家现仅有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且修订周期长。我们亟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建立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涉老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式养老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应加快论证启动重点领域施策及立法进程，如老年监护制度、老年人社会优待政策、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标准等。

此外，科技革命正在为养老发展和老龄社会治理提供新的应对资源和可能路径。目前，国家正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产业链和生态链，未来还需在降低养老服务成本、城市适老化改造、算法治理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政策与治理

（上接1版）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上来讲，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法与往年相比有明显变化，释放了明确信号，有利于提振信心和鼓舞士气。中央定调货币政策取向是“适度宽松”，具有极强的信号意义，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资金空转，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银行稳健经营，有利于提振投资信心和消费意愿，增强经济向好势头。财政政策方面，中央财政还有较大举债空间，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等方面体现出更加积极取向，将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充分激发活力，需要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先立后破”的要求，政府的“有为”更多体现在立规建制与清理破除“两手都要硬”。一方面，突出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使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各地方和各类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都不可能靠地方保护和“内卷式”竞争实现，而是靠创新和公平竞争，所以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破除封闭的小循环。

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新动能以质取胜，需要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规模都有

很高的要求，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抬头，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我国主动携手全球南方国家迈向现代化，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特征之一就是“充分开放”，要用好经济纵深广阔和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推进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不断提升国内市场的对外影响与吸引力，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需要政策主动作为、更加积极有为。

“更加积极有为”需要狠抓贯彻落实

在当前这个时点，我们有了更大底气、更好条件、更强物质基础，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党中央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扎实推动经济稳定向上、结构不断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提高政策整体效能，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以战略思维和全局视野来统筹谋划经济工作，防止政策相互掣肘。在丰富政策工具的同时也要强化协同创新，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一致性评估，建立政策文件评估机制，重点对政策文件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是否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性抑制性影响、是否会对社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等进行评估。既要避免“分解谬误”，也要避免“合成谬误”，防止不同政策相互掣肘，消除“中梗阻”，打出有力高效的政策“组合拳”。同时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

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

紧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举措落实落地，突出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尽快出台，加快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出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广阔和超大规模市场环境，指引更多企业向新而行、向绿转型。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质效向好，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既要推动传统产业“稳得住”，又要推动新产业“立得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大力培育壮大数智结合、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积极运用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多措并举让“老树发新芽、开新花”。

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扩大内需不只是短期稳增长的一时之策，更是长期战略之举，要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做强国内大循环，尤其要优化就业—收入分配—消费的循环机制，通过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持续提升消费意愿和能力。在消费能力提升基础上，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创造条件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是否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性抑制性影响、是否会对社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等进行评估。既要避免“分解谬误”，也要避免“合成谬误”，防止不同政策相互掣肘，消除“中梗阻”，打出有力高效的政策“组合拳”。同时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

环，另一方面，更好带动和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支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温度。把牢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和呼声，更大力度稳定就业，实施好针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就业支持计划，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重大项目工程建设，深入实施以工代赈。着力促进居民增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把适度提高养老金、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等各项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守住兜牢民生底线，让居民家庭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重”建设利当前惠长远，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既要持续激发增长内生动力，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强财政和货币金融工具协同配合，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参与“两重”项目建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最紧迫、最根本的大事难事，及时回应民生关切，把项目高质量建设与民生保障结合起来，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健全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全力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所副所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因鲜明的专业优势，在基层治理系统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为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专业社会工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更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过去“社会管理”的概念，意味着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事业需要改变以往单向度的管控思维，代之以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思维。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涉及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和公平正义，这为构建基层治理的新理念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是人本理念。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要为人们创造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需要直面问题和挑战，积极回应不同人群的多样化诉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社会工作在助人实践中，强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原则，注重协助服务对象挖掘个人潜能，提升解决问题能力实现“助人自助”。

其次是服务理念。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对人心的凝聚与引导，而服务就是赢得人心、增强认同的有效路径。在基层治理领域，必须把服务作为基本的治理理念，倡导建立各行各业的服务型组织，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尽可能从源头上消解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服务是最好的治理，专业社会工作是以助人为特征的社会服务活动。通过发挥社会工作扎根基层、紧贴群众的服务优势，在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应对困境中增进情感连接，增强社会团结。

最后是互动理念。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共治过程，因而其效能取决于各个主体之间能否形成协同、合作、共赢的积极互动关系。专业社会工作强调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性，重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双向互动。在基层治理中，通过社会工作服务活动激发个体潜能、整合社会资源并动员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与社会发展建设中，通过服务对象为本的赋能策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格局。

专业社会工作力量是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还是社会协同的基层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专业社会工作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动主体。

专业社会工作者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基层治理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典型代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再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各种创新模式中，社会工作者凭借专业优势成为其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社会工作者通过协助个体及家庭处理困难与危机，开展居民心理建设，为特殊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等专业化行动，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专业社会工作者是推动基层治理资源协同整合的主体之一。多主体的协同共治需要有促进协作共享的基本机制。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专业赋能，协助培育基层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激发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力。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作为链接资源的桥梁和纽带，把社区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把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公益慈善资源与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进行对接，形成不同主体之间多维度的联动机制。

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工作不仅关注个体的福祉，还致力于解决家庭矛盾，促进社区和谐，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这些新特征新变化，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独特的专业优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从微观层面来看，活跃在基层一线且直接开展基层治理活动的社会工作者，是职业化的社会服务力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在于专业性。社会

发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专业优势

□ 原会建 叶鹏飞

工作者通过个案工作方法以个人和家庭为服务对象，致力于帮助个人及家庭缓解压力、解决问题，促进个体及家庭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能力。同时，社会工作者还通过小组工作方法，开展社会协同的基层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专业社会工作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动主体。

专业社会工作者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基层治理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典型代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再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各种创新模式中，社会工作者凭借专业优势成为其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社会工作者通过协助个体及家庭处理困难与危机，开展居民心理建设，为特殊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等专业化行动，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工作鉴于其本质属性，以及在服务民生、政策倡导、促进参与等方面的功能与优势，以特定的社区为对象，致力于推动社区参与，解决社区成员面临的集体性问题，改善人们生活品质，为促进社区团结和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专业方法支持。同时，作为一种注重环境和结构因素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通过提升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居民自治的良好互动关系，促进社会成员成长发展、社会和谐，有效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升。

总而言之，社会工作鲜明的专业优势能够较好契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应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专业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社会观察